



前不久,在新疆博物馆“故宫厅”举办的“盛世琳琅——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玉器展”中,可以看见各种精美的玉器,其中一枚和田白玉籽料雕琢而成的扳指尤其引人注目。它高2厘米、直径2.4厘米,呈圆柱形,内镶嵌黄金,外层玉料上雕一个大大的“黼”字,是清廷皇族婚庆时使用的。这枚小小的扳指,内金外玉,华贵与古朴并存,是游牧文明与中原文明融合的产物。

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另一件碧玉刻诗扳指,做工也十分精美,高2.2厘米,直径2.9厘米,外壁雕填金地萱花一枝,另一侧有填金《御题萱花诗》一首:“叶绿与花黄,无情自在芳。持将赠屈子,定是不能忘。”

我们知道,入关以前,满族是一个骑射民族,他们经常在野外打猎。打猎用的工具主要是弓箭,为避免拉弓放箭时拇指受伤,他们就用桦树皮或鹿角,做成一只指环戴在指头上。清朝后,扳指制作得越来越精美,逐渐成为一种装饰品。

坐在一方条桌前,凝神专注,左手握着一块石头,右手挥动刀笔如行云流水般……在位于新疆天山天池的邹氏微雕工作室里,51岁的非遗传承人邹溪全身心投入新作品《洛神赋》的雕刻,旁若无人。

邹溪的父亲邹井人是石刻微雕艺术家,受家庭熏陶,邹溪10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微雕,后来去天津美院特种工艺班学习,毕业后与父亲潜心创作。阜康石刻邹氏微雕入选第四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邹溪也先后被评为“新疆工艺美术大师”“自治区高级民间艺术家”。

“选材是直接进行立意的过程,好的立意又是好作品的基础。”邹溪说,这门艺术要经过选材、创作、精雕、修添、着色等10多道工序,有时碰到一块上好石头,却没有好的思路,或者石头特别名贵,不忍轻易下手,“作品都是经过再三推敲,深思熟虑后才开始动刀的。”

红彤彤的悬崖峭壁上,火光映照在苍老坚韧的胡杨上,隐隐泛着红光,天山脚下——群骏马正在奔驰……

这件名为《火焰映古木 宝马出天山》微雕作品构思奇特,再现了大美新疆奇景。邹溪回忆,这块鸡血石的血色在石料右上方,且坑洼不平,将石料买来后,多年都没有创作灵感。偶然间,他想起了新疆火山,于是在鸡血石下部雕刻了一群马,中景雕刻胡杨木,远景利用鸡血的红色点题,同时微雕一篇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,把古人对秋感悟用火一般的天山壮美进行诠释。

“熔古今为一炉,汇微雕书画于一石”的独门绝技在邹氏父子的微雕作品中展示得淋漓尽致。他们用刻刀、刻针将大漠孤烟、塞上明驼、一川碎石、西风烈马、天山明月等丝路文化展示于方寸玉石之上,为作品注入了灵魂。为此,父子经常去观察动物,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,还走遍天山南北,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。此外,他们还从一部部经典文学作品获得很多滋养。目前为止,父子合作创作约500幅作品。邹溪说,虽然父亲因年龄大,视力不好,大多是自己来操刀,但父亲会在旁指导,令作品有更多的表现意义。

石刻微雕作品从大处入眼,精微雕刻,每平方厘米200余字的微雕,或篆、或草、或行、或楷,石中画、画中书,浑然一体。这些常人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字是怎么刻出来的呢?邹溪说,刻这样的微小字是不用眼睛看的,

只是凭靠熟练和感觉。每创作一件作品前,他都要把所刻的诗词歌赋熟读背诵,抄写好多遍直至准确无误才下刀,最大程度减少出错。用他的话说,整个创作的过程“如履薄冰”。

秉承了父亲的专注和对石刻艺术的热爱,多年来,邹溪潜心投入微雕艺术创作中,他们的作品极富国画风骨和金石韵味,被知名人士和收藏家收藏。在其工作室展柜上,摆放着20厘米高的石头微雕作品《金刚经》,6000多字布局奇巧,字体遒劲,气韵生动。“《金刚经》雕刻时要很用力,速度也要均匀,这件作品用时3年创作完成。”另一件作品《九仪昆仑》,历时5年精心打磨,获得2013年“新艺杯”新疆工艺美术精品大奖赛银奖。

这些年,邹氏父子除了创作外,还去学校等地传授这门技艺,出版了《读石心悟 邹氏父子石刻微雕作品集》。“手艺人也是守艺人。我们不仅要精进自己的技艺,还要把这项技艺传承好,让传统工艺走进人们的生活。”邹溪说。

石榴云/新疆日报记者 贾春霞

扳指起源于古代狩猎活动中,早期叫鞞。使用时,将鞞套于弓箭手拉弦的拇指上,保护手指不被弓弦勒伤。早期的鞞用动物皮革或骨制作,在洋海墓葬曾出土用这两种材质制作的鞞,一件皮革制鞞,呈环形,高5.4厘米、直径3.1厘米;一件骨管加工的鞞,高3.6厘米、直径2.8厘米、厚2.1厘米。

鞞到后来逐渐成为男子的装饰品,用玉石制作的鞞都比较精致,有的还装饰着十分精美的纹饰图案。《诗经》中说:“芄兰之叶,童子佩鞞。虽则佩鞞,能不我甲。容兮遂兮,垂带悸兮。”在当时“佩鞞”不仅是时尚,也是一种成人的标志。

考古资料中,最早的玉鞞当数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件青黄玉鞞,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,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玉鞞。这件玉鞞高2.7厘米、直径2.4厘米,用新疆和田玉材制作,为圆筒形,下端平齐,上端斜口,可套入成年人拇指。其外壁以双勾线和平地隐起手法雕饰兽面纹,

在兽面纹一侧有两个圆孔,相对的一面有勾弦用的凹槽。凹槽的存在说明早期玉鞞具有一定的实用性。

春秋、战国时期的玉鞞由筒形而出现侧板,开始由实用性向装饰性转变,西汉时玉鞞已经完全演变成装饰性的玉鞞形佩。至宋时,人们对鞞已有隔膜,鞞形佩被看作仿古玉器,称螭螭佩,到清代时已发展为扳指,除用作男性装饰外,还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。

有弦槽的坡形扳指出现较早,后来弦槽逐渐消失了。传统的中原扳指与游牧民族的扳指略有区别,前者侧面观为梯形,即一边高一边低;而后者一般为圆柱体。如这次展示的一件清代白玉螭螭纹鞞,用白玉籽料雕琢而成,带有黄皮色,高4厘米、直径2.4厘米,上宽下窄,是一个颇具中原风格扳指,为仿古玉器。螭螭纹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兴盛,螭螭传说为龙的第九子,不仅出现在青铜器中,在玉雕中也十分盛行,一直沿用到清朝。这件和田玉鞞的螭螭造型优美,生动活泼,方寸中让人

们感受到中华玉文化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。中原风格的鞞在各地都有出土,许多都用和田玉雕琢而成,如河南永城汉墓出土的玉鞞形佩,采用透雕和阴刻的工艺,雕琢出流云纹和卷云纹,十分精美。

清代对使用扳指有着极其森严的等级制度。和田白玉、翡翠、玛瑙、珊瑚等名贵材料制作的扳指,非王公贵族,一般人是不能随意佩戴的。满族贵族喜欢使用翡翠制作的扳指,色泽亮丽。普通人佩戴的扳指以象牙、瓷质为多。扳指的大小厚薄,依使用者文武身份定夺,武扳指多素面,文扳指则多在外壁精刻诗句或花纹。

西汉文学家刘向《说苑》中有“能决烦乱者佩螭”,佩螭与鞞,都表示君子善于解决问题的寓意。演变至今已成为中华民族“君子比德于玉”“君子无故,玉不去身”的传统文化,君子以玉来象征德行,他们随身佩玉以示高洁,玉不仅仅是装饰物,更是明志修德的标识物。

阿迪力·阿不力孜

从“明约路碑”到“左公柳”

——文物述说“左宗棠事迹入编教材”背后的历史

“大破贼于喀什噶尔……分兵追贼至明约路玛克,生擒贼首于小虎、马元、金相印父子并伪主牙虎柏诸子孙……所有在事诸将,具勒名碑阴,以昭后人……”这是名为“明约路碑”的碑文。它曾立于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一个名叫明约路(意为干路交会处)的地方,现存于新疆博物馆。在“新疆历史文物展”清代展区里,可以见到它的3D打印玻璃钢复制品。

在今年专门修订的人教版《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》中,新增了关于清代“边疆危机”的内容,在“收复新疆”部分中详述了“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,督办新疆军务”“左宗棠命刘锦棠入疆,采取‘先北后南,缓进急战’的策略”等过程。同时,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——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》中,也将左宗棠收复新疆纳入“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”章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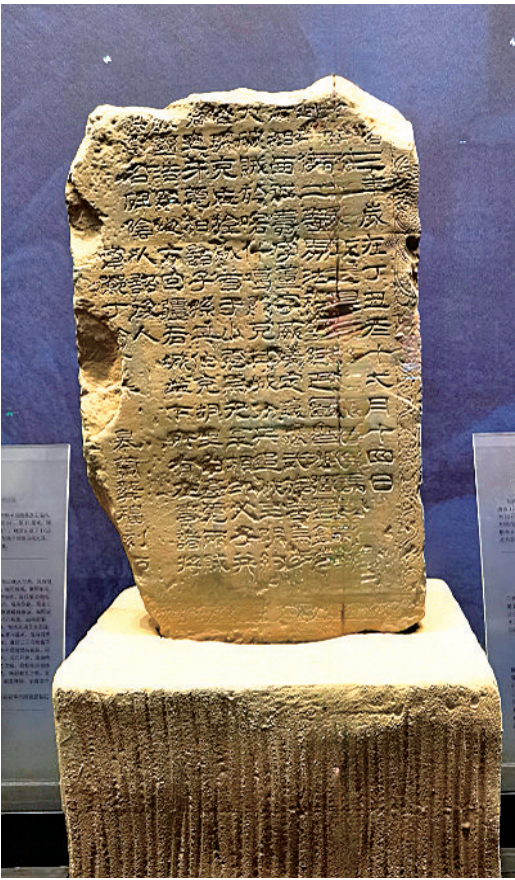
“明约路碑”就是教材所述历史的实物见证。这座高1.35米、宽0.77米、厚0.14米的石碑经风蚀水侵,近两百字的碑文已有部分难以辨识,但主体内容的意思很清晰,这块碑刻反映了1877年清军收复喀什噶尔(今喀什市),在明约路大败阿古柏侵略势力及收复南疆各城的情况。

1877年,左宗棠部将刘锦棠率军收复喀什噶尔后,在明约路大败阿古柏侵略势力,俘获了匪首于小虎、马元、金相印父子以及阿古柏的妻妾子女等,并缴获了大炮、枪械及马匹,至此彻底击溃了阿古柏侵略势力。为了表彰“在事诸将”收复失地的功绩,刘锦棠立“明约路碑”以昭后人,碑刻的背面还记录了参战将领的姓名、官衔、籍贯。

1865年初,阿古柏入侵新疆地区,各族民众持续进行与侵略者的坚决斗争。1876年,左宗棠命刘锦棠率军入疆,各族军民有力配合了收复新疆的行动,清军所到之处,民众夹道欢迎。在《左宗棠全集·奏稿六》中记载,清军到达阿克苏时,“城内十数万人皆守城以待官军”。就这样,到1878年,清军成功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地区的领土。



陈列在新疆博物馆《新疆历史文物展》中的左宗棠行书七言联。



陈列在新疆博物馆《新疆历史文物展》中的明约路碑复制品。

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,清政府自1877年起就与沙俄多次交涉收回伊犁事宜,最终在1881年签订中俄《伊犁条约》,收回了被沙俄侵占的伊犁。

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风景区的水塔山上,有一处名为“一炮成功”的纪念地。1876年8月,刘锦棠率领清军在迪化(今乌鲁木齐)六道湾山梁上架起大炮,向迪化城内开炮,打得阿古柏溃不成军,四散逃窜,接着清军收复了迪化。随后,当地民众在架炮的地方修建了炮台,命名为“一炮成功”以纪念。如今在炮台附近矗立着一座左宗棠的全身塑像,它在山巅远眺着乌鲁木齐的城区,守望着百姓的平安生活。

“参加收复新疆的清军主力来自全国各地,包括湘军、豫军等。清政府在新疆各族民众的大力支持下,驱逐了阿古柏侵略势力,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。”新疆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维国说。

除了“明约路碑”,还有一块1988年在哈密市柳树泉农场附近发现的“左宗棠碑”,现藏于哈密市左公文化苑。这座石碑被发现时已残缺,仅剩下半部,约0.77米高,记录着左宗棠命广东陆路提督张曜在哈密屯田积粮,优化运输通道的经过。

据记载,1875年5月,清政府任命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后,他就安排部属积极筹集饷银、调配粮草辐重。专家认为,“左宗棠碑”所记内容说明了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,很重视后方保障补给和建设。

孙维国认为,明约路碑和左宗棠碑,都实证了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,各族人民始终团结一心,共御外侮,为维护国家主权统一而斗争的历史史实。

在哈密,有一种古树的名字叫“左公柳”,这是左宗棠及部属在进入新疆路途中所栽种的柳树,意在树林防风固沙,改善环境。据记载,当时经过十余年的护理,确实达到了“所植道柳,除戈壁外,皆连绵不断,枝拂云霄”。

“新栽杨柳三千里,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直到今天,哈密市里存活的“左公柳”依然枝繁叶茂。

石榴云/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

和田文物



陶罐

商末至春秋(公元前1100—前476年)
2004年于田县流水墓地出土
和田博物馆藏
流水墓地出土的陶罐均夹砂,有红陶和灰陶2种,有的不带耳,有的单耳,有的双耳,器体装饰有刻划纹、弦纹、乳钉纹等,不少陶罐下部残留有烟灰痕迹,证明它们是用于煮饭的实用器。



玻璃来通

汉至晋代(公元前206—公元420年)
民丰县尼雅遗址采集
和田博物馆藏
新疆共出土三件“来通”,两件是陶器,一件是玻璃器。其中和田出土两件,一件是约特干遗址出土的陶来通,一件是尼雅遗址出土的玻璃来通,“来通”这个词源自于古希腊人的称呼,取连通、流出之意。它像一个漏斗,可用于注入神酒,当时人相信“来通”是圣物,用它注酒能防止中毒,而如果举起“来通”一饮而尽,则是对酒神致以最高敬意的方式。“来通”,从克里特岛起源,再到希腊人的追捧,进而便向亚洲开始传播,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到阿姆河的广大区域,最终流入中国。



几何纹刺绣皮靴

东汉晚期至三国(2世纪中期—265年)
1995年民丰县尼雅遗址1号墓地M3出土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
出土时穿于男尸脚上,皮底,皮帮,矮腰,表面用丝线勾结三角形和T形花纹,华丽不凡。后跟皮帮外缝贴锦面,鞋腰上口用宽3cm的绿绢滚边,并用绿色绢带缠扎三道。鞋底已磨损,应为实用物。



木尸

夏至商代早期(约公元前2070—前1500年)
克里雅河北方墓地采集
和田博物馆藏
以原木雕刻成木人形状,有头、身、腿、足,无上肢,面部无雕刻。此木俑出自克里雅河北方墓地,与小河墓地出土木俑一样,是代替墓主下葬的人偶。当墓主因意外身死,或迁葬等原因尸骨不存,便以木尸全部或部分代替死者进行安葬,使死者的灵魂有所归依。